KAISHENG 凯盛家纺 一个梦想 一种生活
地址：高邮市府前街66号（老市政府西侧）
团购热线：18952550078 13773313339

抗战时期刘伯承曾力排众议启用首位『女参谋』

抗日战争中，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渡河东征之后，大批知识分子涌进了刘伯承所在的一二九师。

一天，一个姓郭的女大学生到师部找师长刘伯承。刘伯承热情地接见了这个女大学生。交谈之中，刘伯承得知她为寻找抗日救亡的军队，曾去投考国民党中央军校，几经周折后才跑到太行山，来投奔八路军。她向刘伯承直接提出想当作战参谋。刘伯承从心里赞赏这个女青年的胆识，便答应把她的请求向组织反映。

女青年走后，刘伯承立即征求作战科长和参谋们的意见。大家非常欢迎大学生战友到自己队伍中来，可一听是个女大学生要来当参谋，大家都不同意。

刘伯承有些生气地问：“人家是大学生，有文化，你们为什么不要？她一心抗日。先去考中央军校，人家不要她；咱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，为什么也不使用人家？张国焘思想流毒的那个‘鬼’，还在毒害你们呀，要认真打‘鬼’才行！”

参谋们都哑口无言了，最后不知是谁壮着胆子从嗓子眼里嗫嚅挤出几个字：“女的，干军事……”

话还未了，刘伯承就开始反驳这个封建、落后的观点：“女的？女的照样领兵打仗，挂帅称将。咱们苏区和红军中，娘子军连、女兵队有的是，干军事当师长、游击队长的也不少，你们都忘了？怎么越革命思想越倒退？”

参谋们觉得师长说得有道理，但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。有人说：“既然组织上都同意了，我们有什么办法呢，我们举双手欢迎！”

刘伯承听出大家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想通，便说：“我可不光是双手欢迎，我还要先伸手去向组织上要她哩！免得别的部门先要走了！”

听了这几句话，大家深感师长对人才的爱惜。

郭同志的申请很快被组织批准，她成了一二九师第一个女侦察参谋。不久，郭同志就立了战功。她奉命去侦察鬼子的一个炮楼，执行任务时突然受到袭击，敌人的流弹打中了她的腿。郭同志凭着顽强的意志，拖着伤腿，回到了司令部。她顾不上包扎伤口，就急着向领导汇报印在脑子里的那张敌情图。然后，她才住进了医院。

刘伯承听说后，亲自到医院看望了这位女参谋。他经常用郭同志的例子教育轻视大学生、特别是轻视女大学生的同志。大家深受教育，思想上发生了较大转变。（摘自人民网）

责任编辑 张维峰

1926年“文人”陈毅与徐志摩的“交锋”

徐志摩（资料图）

1926年1月，为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，陈毅写了一篇《纪念列宁》寄给徐志摩，“为的是使列宁纪念能在善于反宣传的《晨报》上吐露一点消息”，结果却引起编辑徐志摩的反感。徐回应了一篇《谈革命》，说列宁是“一个造警句编口号的圣手”，又说陈毅是“弄弄火，捣些小乱子”，是“盲从一种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，在幻想中假设一个革命的背景”。

对徐志摩的文章，陈毅称其“词旨渊懿，极尽讽刺挑拨之能事”。于是，他又写了一篇《答徐志摩先生》发表在《京报副刊》。文章中，陈毅认为徐志摩已经不是单纯的“诗人”或“诗哲”了，而是“完全研究系化了”，这只要从他“推论孙文先生是俄国籍人，我们便可领教诗人笔下的锋芒与阴隐”。最后，陈毅还说：“徐先生不要责备共产党人铁的心，铁的手，你且看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宝刀，与学士文人们的刻薄的刀笔罢。”“像徐先生这样的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，真值得我来教训一番了！”

彼时，陈毅以“我认识我自己，我更认识我的国家、我的世界”来“教训”已经成为“研究系”吹鼓手、“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”、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先生们”的徐志摩，同时也捎带批评了“研究系”大腕梁启超等，认为他们“得了研究系的睁眼不顾事实一派家传，否认由经验而得来的革命教训”，这“经验”就是由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启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事实，所谓“全世界人类中以工农为最多最受压迫，尤其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工农更堕在十八层地狱的最底一层。试问工农问题不解决，所谓民族问题能够解决么？”“我们再问，翻开一部人类的历史，所有的革命运动，谁不是仗着贫苦的工农为主力军？列宁知道这个，运用他独特的天才，根据马克思主义，创为工人与农人联合的革命，以决然断然的态度去求实现——果然奴隶们翻了身。”

陈毅还现身说法，讲述了一段自己的认识过程，也是他心路历程的剖析，这难能可贵。他说：“我从农村跳入当铺里当学徒，由当铺出来进学校，小学、中学、专门工业学校，而后到欧洲成为一个产业工人，勉强又在洋学校里见识了一下。回国仍然受债主、土豪、劣绅、军阀、洋奴等人物压迫。一个人当然可以沉默了事，或者抱着女人老于山林。但是为了一般民众，就完全不能沉默，尤其要完成革命工作，自己就不能不起来奋斗。尽管有了这样的决心，中间还经过几次周折。第一是在与军阀周旋的时候，第二是沉湎于文学生活的时候。前者当然是积极堕落，后者何尝不是消极堕落，想以眼泪或笔墨不取悦权贵，至多替弱者表同情罢了。幸而我觉悟了，知道一个人不能完成社会的改造，决不能完成自己。要完成自己只有从抛弃个人主义做起。所以这时我才将一切抛弃，营我的党的生活。”

多年后，徐志摩早已化成青烟，陈毅则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市的市长。此时，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生活在上海。徐志摩罹难之后，陆小曼的生活逐渐陷入困境，只能不时卖画聊作生活补贴。上海解放之后，在著名画家钱瘦铁等举办的一次画展上，陆小曼也展出了她的画作。然而，她没想到，这几张画竟改变了自己后来的生活境遇。原来，画展当天，陈毅也来到了现场，来到了陆小曼的画作展示区。他凝视着陆小曼的画，觉得十分清新。这时，有人告诉陈毅，陆小曼就是徐志摩的夫人，陈毅马上说：“我曾有幸听过徐志摩先生的讲课，我是他的学生，陆小曼应是我的师母了。”当陈毅得知陆小曼生活艰难的情况后，感慨不已。后来在陈毅的关心下，陆小曼成为上海中国画院的一名画师，从而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，也就此摆脱了生活困境。（摘自人民网）

康熙的特殊旨令：四次“万嘱”关怀曹雪芹祖父

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创意旅游纪念品“朕知道了”胶带风靡一时，这几个字是复制于康熙回复给大臣的密折中的真迹。你知道吗，在该院收藏的那些清代密折中，就有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发自南京的亲笔，是直接递到皇帝手里的，内容也大多与南京息息相关。

给康熙的密折是专奏专闻，即时批复

在台北故宫博物院，有一个《知道了：硃批奏折展》。“知道了”是皇帝批阅大臣奏折的常用语，“硃批奏折”是经皇帝亲自用硃砂批阅的奏折原件。

据曾昭英文章介绍，从康熙开始，清朝就建立了“密折”制度。这是只供皇帝一人专看的，比作为国家机密的军机处档案更为机密。正常折子交给通政司审阅后再呈交，特别长的，还会由大臣写“贴黄”，即附黄纸，概括要点。而康熙的“密折”则是专奏专闻，不经过通政司，直接递到皇帝手里。折面上不写奏者姓名，只写“南书房谨封”字样。康熙即时批复，他一度右手有病，强用左手批复，毫不耽误，一则防泄密，二则可以深入了解真相。

1924年溥仪出宫后，人们发现一个小木箱，内藏一批康熙朝的密折，主要是包括曹寅在内的三个江南织造上的奏折。这三人都是宫廷内务府旗人，全部亲笔缮写密折，短小精密，汇报内容由民情世风到雨水收成，不一而足。

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展出的硃批奏折时，笔者意外发现了几份大约300年前由“江宁织造、通政使司通政使臣”曹寅“谨奏恭请圣安”的奏折，细看内容，也都是与南京这个昔日明都息息相关的。

详报“明孝陵西北角塌陷”事件，以防“谣言流播”

在一份“江宁织造、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曹寅”写于康熙四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（1708年7月12日）的“谨奏恭请圣安”的奏折中，他向康熙报告了两件事，其中一件是关于明孝陵的：

“江宁洪武陵冢上西北角梧桐树下，陷塌一窟口，面有伍尺余寸、深约贰丈余，下视如井。臣念洪武陵有御赐碑额，太监看守。因民间讹言冢已塌下，臣随往勘验，离地宫尚远拾伍丈余，毫不相关。原系当先培填之土不坚，日久，值雨冲塌，水流宝城之外。当有地方该管官员，即命陵户挑土填平。恐谣言流播，讹传失实，有廑宸衷，合先奏闻。”

称洪武陵而不称明孝陵，是避讳“明”字。“民间讹言冢已塌下”事关重大，因此时离南明永历帝1661年被吴三桂绞杀才47年，“反清复明”的暗流仍在民间涌动。离1681年剿灭吴三桂也才27年，人心是否安定也未可知。为此，康熙还曾专程谒洪武陵，立“治隆唐宋”碑，以笼络人心。

更为严重的是，那一两年江南地面不平静，康熙在曹寅奏折上的硃批，也担心“又闻盗案甚多”。曹寅在康熙四十六年九月廿日（1707年10月15日）的一份奏折中向康熙解释说：“盗案原系浙江旧案，鼠窃狗偷之辈。当时匿家光福山中，转攀拿获，自知不免大戮，恐该衙门动刑痛苦，遂妄为大言，使问者不敢施威，以免一时之累。缘巡抚远出苏城，又无老成之官，一时城栅过于严防，以致百姓惊慌。其实不过寻常盗案，并无连海结伙不轨之事。后恭闻皇上圣谕，责地方以不加查察盗案，凡臣民无不欢忭，以为天鉴如临，明洞万里。目下各官知戒，小民俱安堵如常。理合一并具摺奏闻，伏乞圣鉴。”

曹寅在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日（1708年3月22日）奏折中又解释说：“臣闻得四明山通福建，历来盗贼之巢穴，此辈皆在别省行劫，归藏山中，形迹幽秘，其来已久。以前未尝不犯，问官只问眼前现在之案，不株连根抵，故四明山巢穴，人皆不知。去年为百姓有买米下海之谣，又巡抚中军分兵披甲拿人，致令上下纷扰，故问官详据口供。令蒙皇上差各大臣严审，将来自可穷绝根窝，永无夜警。至于奸僧一念委给付之事，即如晌马贼歃血拜盟一类，皆由于地方官员柔弱懒惰，诚如圣谕‘不勤不慎’所致。当此天下富强之时，大臣静妥任事，小吏勤慎奉公，何务不办。琐细小事，动辄上闻，或借此掩饰，见其勤劳。或借此密奏，见其亲近，亦未可定。安能逃皇上洞彻万里之明，终于自误而已。所有百姓情形委细，未免字逾常格，臣谨具列奏闻。”

曹寅认为这件事本不大，只是鼠窃狗偷之辈，恐衙门动刑痛苦，妄为大言，使问者不敢施威，以免一时之累。而地方官员办事不力、虚张声势，造成百姓惊慌。而且他认为，琐细小事，动辄上闻，或借此掩饰，见其勤劳；或借此密奏，见其亲近。

尽管如此，有些客观现实是回避不了的。这从曹寅附在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十二日（1708年5月2日）开桌折内的“奏陈浙江审张廿一案由折”可见端倪。此案涉及的“朱三太子”，民间传说是崇祯的三儿子，是“反清复明”的一面颇具号召力的旗帜。其实，早在南明弘光小朝廷就闹过“太子”案，但那个“太子”不管真假，已经被降臣送给清军，没想到又冒出个“朱三太子”来。好在康熙已得到消息，他硃批道：“山东地方将姓朱的父子三人都已拿住了。口哄（供）势甚明白，但一念拿住方好。”不久，曹寅在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（1708年6月4日）奏折中也奏报了“朱三太子”在鲁获解的消息。

由于以上这些种种不安定因素，故而曹寅听到“洪武陵冢上陷塌一窟口”的消息后，不敢怠慢，立即“随往勘验”，并“恐谣言流播，讹传失实，”使皇帝内心焦急，就将勘验情况和处理结果及时向皇帝报告。康熙在奏折上硃批：“知道了，此事奏闻的是。尔再打听，还有什么闲话，写折来奏。”

康熙的硃批肯定了曹寅的报告，并且要他继续打听，随时上报，可见康熙对这件事也是相当重视的。至于“陵冢上西北角梧桐树下，陷塌一窟口”是否“当先培填之土不坚”？还是另有“暗道机关”？这就要文物专家去考证了。

四个“万嘱”，体现多疑康熙对曹寅也有一片真心

由康熙与曹寅之间的密折可以看出，曹寅这个江宁织造还要执行一些直接来自康熙的特殊旨令。

康熙四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（1709年10月1日），曹寅密折报熊赐履病故，康熙批：“知道了，再打听用何医药？临终曾有甚言语？儿子若何？尔还送些礼去才是。”曹寅复奏：“遗本系病中自作。闻其遗言，命葬江宁淳化镇之地，不回湖广。”康熙硃批：“闻得他家甚贫，是真否？”曹寅回奏：“湖广原籍有住房一所，田不足百亩。江宁有大住房二所，田一百余亩。江、楚两地房屋约值七八千两。”康熙又批：“熊赐履遗本系改过的，他真稿可曾有无？打听得实再奏。”

熊赐履，字敬修，湖北孝感人，是康熙朝一代重臣，理学家，时人常称他“清廉刚介”。此前康熙和曹寅之间密折中就曾多次提到他。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日（1708年3月22日），曹寅在奏折中向康熙报告：“臣来时蒙圣谕令臣存问原大学士臣熊赐履，已于二月二十日往湖广拜扫，俟其来时传旨。”当年四月初一日（5月20日）的奏折中又说：“任大学士臣熊赐履，于本月初一日回江宁，即至臣处，跪请圣安。臣将前存问之旨宣讫，熊赐履望阙叩头谢恩云：‘臣惟有全家顶戴感激天恩。臣自湖广来，一路太平无事。’随即回家。”由此可见生前，康熙对熊赐履是礼敬有加的，谁知其身后康熙还有那么多问号在等着他。

由此想到另一件值得一记的事。康熙五十一年七月（1712年8月），曹寅染上疟疾，他让李煦密折上奏，向康熙讨药。当时治疟疾最好的药是西洋进口的金鸡纳霜（奎宁），但即便以曹寅之富有，也难以搞到。

康熙立即批复：“尔奏得好，今欲赐治疟疾的药，恐迟延，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。但疟疾若未转泻痢，还无妨，若转了病，此药用不得。南方庸医，每每用补剂，而伤人者不计其数，须要小心。曹寅元肯吃人参，今得此病，亦是人参中来的。金鸡纳霜专治疟疾，用二钱，末，酒调服，若轻了些，再吃一服，必要住的，往后或一钱，或八分，连吃二服，可以除根。若不是疟疾，此药用不得，须要认真。万嘱！万嘱！万嘱！万嘱！”

四个“万嘱”，从北京到扬州，康熙派快马赶去，也算一片真心，虽然最终曹寅还是不治而亡，但这也算是一段佳话了。（摘自人民网）